我的蒙中情缘

梁仓

人们常说,回忆是一种享受,尽管过去的好些地方都无法和现在相比，但是每每说起过往的一些人和事，总是能让人娓娓道来、滔滔不绝……如此这般,也就不要怪怨人们常说“岁月如歌”了，“岁月如歌”的本意大概是说随着岁月的流淌,仿佛歌曲的旋律跌宕起伏,忽而置于峰顶驻足,引吭高歌引人入胜,忽而跌在低谷徘徊,浅吟低唱扣人心弦,纵览我的人生经历也大概如此吧。

这些天,我在“老民中”的微信群里看到了许多熟悉的身影：位居市领导的阿老师(还是原生态称呼亲切)仍然情系教育，时不时发一些关于教育教学怎样与时俱进的探讨文章。是的,阿老师是教师起家,由教师、校长、科长、局长,一步一个印记，脚踏实地走到了市领导位置上,他不骄不躁、平易近人,尽职尽责、廉洁奉公，无论在哪个岗位上都能赢得人们的交口称赞;“骑士鄂尔德尼”还是那样直爽豪放、幽默风趣、粗中有细,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前为什么要加“骑士”两字，这可能与他的性格有关吧，他从教师、主任,做到校长、书记,把校园里的“官”体验了个遍,时至今日仍然在教育教学的最前线冲锋陷阵；还有在达旗蒙中当领导年限最长的“拉格胜”,相传在蒙中校长的位置上“圆锁”才改行到了行政上,目前,让位于年轻人后,每天按时给老母亲做饭、做家务,弥补以往因忙于工作而对母亲的亏欠，时不时地还组织“老民中”们叙一叙旧,回味一下曾经的“苦辣酸甜”;还有大器晚成的“其劳”,他是蒙中建校的第二届学生,毕业留校,今天是蒙中的常务副校长，我常常和他开玩笑，其劳的履历就一道道：念书在蒙中,工作在蒙中,将来退休也许仍然在蒙中;我的老邻居白玉珍,在蒙中副校长的位子上高就于市教育局，在一些婚宴喜事上也曾见过几面；当然还有“护花使者”贾武军……还有好多老同事、老朋友,看到你们格外亲,用冯巩的那句话说就是“我想死你们了！”

刚才我口无遮拦、粗浅地回忆了在蒙中遇到的那些人，不过这只是其中的“一小撮”，还有好多，他们都是至亲好友、良师益友，樊向阳老师的《古汉语对照释义》、刘风老师的《作文大观》让我敬佩不已,真的是须臾间视才见。

我在达旗蒙古族中学教学岗位上待了十一年，而且是在乡下学校锻炼了四年后,才调回来的,于1996年改行,回过头来看，这十一年是我人生历程中的黄金时期，也就是说我人生最美好的年华是在蒙中度过的。在校期间,我相继教过四个班,尽管说没有多少辉煌业绩,但我我成长、成熟，连同当年在一起的那些人、那些事,演绎成一幕幕精彩纷呈的话剧,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脑海里,有些事情“从来不需要想起,永远也不会忘记”。

别了,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;别了,那曾经赋予我高贵灵魂的人生驿站。

1996年5月,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蒙中，在没有任何年龄优势的情况下踏入了政界，工作一个月后我曾找领导谈话,要求重返讲台,让领导批评了一顿,后来就死心塌地地工作在宣传文化战线上,一干又是十五年。

1999年的十月二十二日,是达旗蒙古民族中学的二十周年庆典。当时我已经离开蒙中三年了,但学校没有忘记我,专门还给我发了一份请柬，面对着大红请柬,蒙中的工作、生活情景历历在目。当时还写过一篇文章，发表在《达拉特报》上,最后一段是:“值此蒙中二十周年庆典之际，谨以拙文记之，略表浓浓情谊。”

树有根,水有缘。这个话题我还想从头说起。1985年秋季,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跨进了蒙中大门,当时只是想,我作为一名汉族教师既不懂蒙语，又不了解蒙古族的生活习俗，能否胜任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，能否同学校的蒙族教师和睦相处？这些都成为我迈进蒙中大门的思想顾虑，刚到校的那几日，我忧心仲仲,极为谨慎地工作、生活着。

开学紧张、忙碌的工作后,适逢第一个教师节,学校精心组织了我人校后的第一个全体师生员工大会,一是为了庆祝教师节,二是举行开学典礼。记忆最深的当数已故的老领导、老书记达樊老师的讲话,他说:“时代在发展,社会在进步,我们学校也面临着教育教学的改革。现在我们学校的教师队伍正在发生着变化,调入许多汉族教师,我们在今后的工作、生活中一定要高度重视团结,只有搞好团结,才能出成绩,才能开创我校工作的新局面。我认为,这些汉族教师的调入,将会更好地促进民族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,因此要互相取长补短,共同进步……”

一席话,给我吃了颗“定心丸”,为我接下来在蒙中的工作、生活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。

当时的蒙中由于建校时间短，社会声誉、教育教学质量、校容校貌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。偌大的操场,中间是起伏不平的沙丘，环绕沙丘四周是两行形似车辙的跑道,学生跑操时,当跑到跑道另一面，站在这面的老师就看不见对面学生的情况;至于蓝球场,一场大风过后,坑坑洼洼,根本无法进行训练比赛;图书室、实验室,几乎是一片空白。

为了彻底扭转这种被动落后的局面,学校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,在前几任领导努力开创的基础上，开始踏上了再创业之路。1991年初冬时节,学校在经费严重不足的情况下，给办公室加装了暖气,还雇了一台推土机平整操场,老书记达樊老师亲临现场指挥施工，等到封冻前,已初具规模。第二年春暖花开后,学校经过周密的安排，在确保教育教学质量的同时,动员师生轮流跟上学校的“东风”汽车,从十里之外的大草儿坝上往回拉红泥垫操场,记得在装满红泥的车上,葛云翔老师的一句“人民红泥人民拉,拉回红泥垫操场”迄得大家开怀大笑。经过近两个月的艰苦劳动,一个6000多平方米、平展光滑的大操场呈现在了全校师生的面前，当年国庆前夕学校在这个操场上召开了第一届田径运动会。

这是改变学校面貌的第一步，也是值得书写的一步,这一步告诉人们:只要有团结这一法宝,就没有干不成的事业。接着教师们牺牲休息时间，舍不得雇用搅拌机，完全靠人力用水泥混凝土浇注了两个近2000平方米的蓝球场,之后改大门、栽松树、植杨树、铺垫砂石路,使校容校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。仅此几项义务劳动就为学校节约资金50000多元,这个数字现在看来微不足道，可在当时却是天文数字。

劳动是艰苦的，有的教师手磨出了血,开了裂,有的一天下来腰酸腿疼,一往下坐就站不起来,但谁也不喊一声苦,不叫一声累。看到一天一个新样子的校园,大家脸上流露出的是欣慰的笑容,就是现在回想起来也觉得是一种乐趣。

环境的改善，不仅能净化师生的心灵，而且能调动师生工作、学习的积极性。生源问题一直困扰着蒙中教育教学的健康发展,为了解决这一问题,学校同有关部门多次协商，决定招收杂散居地区的少数民族学生，并通过提高助学金待遇、改革授课用语等方法扩大招生量。1991年暑假，学校的领导带头深入偏远的农村牧区进行宣传动员，这一年开学学生人数从原来的100多人增至300多人。进入九十年代,学校开始招收汉授高中，前后招了五届七个班，学生人数超700多人,当时有人提出,这样会不会冲淡民族教育?可通过几年的实践,招收汉班非但没有冲淡民族教育，反而极大地加深了蒙汉师生的了解，加强了蒙汉师生的团结，促进了民族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,蒙中的社会声誉随之也在提高。这期间,学校曾连续四年被评为“先进教育集体”“教改先进单位”“民族团结先进集体”。

在蒙中工作的那些年,有一件事真的是让我终身难忘。90年代开始,旗里开始实施住房改革，学校的家属房再建的可能性也没有了,于是充分利用“私建公助”政策,学校免费提供宅基地,一次解决了十二户教职工的住房问题。考虑到教师们的困难，学校把汽车贴上给盖房户拉砖、拉泥、拉沙,装卸工就是没有课的老师,校长“拉格胜”还亲自带队,连续三年互帮互助，直到盖房户们入住为止。现在回过头来总结,那几年蒙中好像自发地组建起了一支“义务施工队”,其中木工、瓦工、电工、油漆工,还有裁玻璃的各个工种都有,而且很和谐、很团结,丝毫没有感觉到蒙汉有别，这些真是值得回忆，而且回忆起来确实也是一种享受。

2017年岁末的一天,我在《达拉特快讯》看到了八十多岁的满达呼老师义务给居民“磨剪子铲菜刀”,最近我又在微信上看到了满达呼老师成为“身边好人”的候选人,我当即就投了一票,并且转发到相关群里,要求投票,这种人当个“身边好人”当之无愧,一个东北蒙古人支教来到我旗,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,一生执教无他求,评个“身边好人”可谓是众望所归。

如今的蒙中,今非昔比,具有极富民族特色的教学大楼、宿舍楼、报告厅、实验室、图书室、塑胶操场,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也被引进课堂,学校面貌焕然一新。盛夏时节,喷泉欢唱,绿草如茵,花团锦簇,映衬着这所学校,使人感到了无限生机，看到了我旗民族教育事业的希望所在。

蒙中的工作、生活经历在我人生的长河中是短暂的，然而这段经历又是难忘的。在这十多年的工作、生活中,我知识上得到了进一步充实，业务上得到了进一步的锻炼，是蒙中培养我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。

常言道:“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”,这校园又何尝不是呢？当我黯然走过蒙中那熟悉的校门,回头看那青松迎风、群楼高耸,我才知道,自己再也回不去那段忙碌而充实、辛苦而幸福的教学时光。

在蒙中的校园里，其实我们都是一个过客,匆匆来,又匆匆去,如同人生一样,很多生命中与你有缘的情和景,终究会像风一样散去，分量重的就沉淀在生命的深处,蒙中就深藏在我的心灵深处。

我和达旗中学的不解之缘

杨凤英

我在达拉特中学旁边生活了一辈子,因为达拉特中学就在我家附近,想看她,举步就到,但回忆她,却贯穿了我的一生。

达拉特中学奠定了我事业的根基

人生有序,不可逆来。只有踏准时令,才不会蹉跎岁月。我在小学毕业之后,顺利考取了达拉特中学。达拉特中学毕业后,我又考到了伊盟一中,读到高二时辍学，被伊盟文教局分配到了海勃湾镇新华书店工作。后来因国家经济困难,大量裁员,我被精减回家。还好,不久后,我被伊盟粮食局保送到内蒙古粮食干部学校，在会计专业学习了一年。回乡后被分配到达拉特旗粮食局工作。人生念书的时间很短，往往错过一次，就错过了一生。尽管三进不同的校门,但我真正受到完备良好的教育,是在达拉特中学的这三年。她从知识、德育等方面奠定了我一生事业的根基,使我以后不论从事什么工作,都能做到得心应手。

达拉特中学锻炼了我的意志和品格

1957年9月开学后,我们就投入到了任务繁重的建校劳动:铲高垫低、平整校园、清理建筑垃圾、开辟操场、挖坑浇水、种树绿化、搬运砖瓦石……1958年上半学期开始,学校陆续开办了砖瓦厂、墨水厂、缝纫厂、养猪场、养兔场、粉坊、豆腐坊……我和大家又一起投入到了各种劳动量很大的勤工俭学活动中。记忆犹新的是打井劳动，我和杜秀英、李秀英、张国英、郝文海、营保生、靳文华、温占清、裴文华等同学被编在了一个组。男生轮流下井作业，女生用柳管往上吊土、吊稀泥。手上打起了血泡,肩膀被吊绳勒出了道道血印子,也从不叫苦叫累。为了能到我们吃的、喝的和生活用水,都是用我们自己打出来的井水,就感到十分欣慰。当看到美丽的校园从风沙弥漫的荒郊拔地而起,我们明白了一个深刻的道理——幸福要靠自己劳动的双手去创造,只有自立自强,埋头苦干,才能实现远大的理想。在紧张的学习和繁重的劳动中,我获得了各种奖励,还被评为“炼钢劳动尖兵”。当走出达拉特中学校门时,我们再也不是肩不能扛、手不能提、四体不勤、五谷不分的文弱书生,而是有知识、有文化、有理想、有担当的一代青年了。

在达拉特中学我收获了恩师和友谊

我一生的人脉交集,多数源于达拉特中学的同学和老师。他们对我有知遇之恩,在人生关键时刻给予我的帮助,让我没齿不忘。李春耀老师,是我在万太兴小学读书时的校长,又是我考入达拉特中学后的班主任,他身上的许多优秀品质,对我的健康成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记得当年的万太兴小学围墙残破,有多处出入口,很不安全，我们女生宿舍是双开门,摇晃即开,锁不死。经常有社会流氓半夜敲门。李校长为了保护我们的安全,制定了由男老师轮流值班、彻夜守候的制度,他带头执行,使我们深受感动。在达拉特中学三班打井时,他始终守候在井口，随时关注井下的安全，为了使井下作业的同学免受冷冻,他自掏腰包买了白酒,放上红糖,让同学们喝酒取暖。他爱护自己的学生就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。马玉中老师是三班第二任班主任，他讲课时严肃认真,一丝不苟,平常和同学们和谐相处,深受大家的爱戴。杨映权校长、闫风威书记、武承轲主任和武守仁、郝万章、李白玉、周成章等老师,教品励学,德高望重，既是我们求知的恩师，又是我们做学问的楷模。我在达拉特中学三年,与同班和同届四班的所有同学,交情很深,友谊纯厚,大多数到了晚年都保持着密切的交往,他们对我的帮助,让我很感激，也给了我无穷的力量,我永远感谢同学们对我的关爱。

达拉特中学培养了我热爱家乡的情怀

我于1940年出生于伊克昭盟准格尔旗,年幼时随父母迁居到达拉特旗树林召镇。我从读书、成家、工作,包括退休后的生活,都是在树林召镇度过的。达拉特旗是我的福地,达拉特中学培养了我热爱家乡的情怀和建设家乡的志向。我热爱家乡的一山一水,一草一木。库布齐大沙漠的生态变迁,赋予了我认知世界的灵感,陪伴我走过了充满诗情画意的美好岁月。随着沙葱的抽芽，沙土地开始分娩生命,连一度白茫茫的盐碱地,也泛起了无边的绿意,接着便是山川草木的苏醒……在这片养育了我的热土上，我经历着冬去春来、岁月轮回。我先后在达拉特旗粮食系统和金融系统工作,工作中我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,心甘情愿为建设好自己的家乡奉献青春和汗水。在长期的奋斗中,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、优秀共产党员，还获得过各种荣誉称号。到退休年龄,我从高银行科级职务上光荣退休,我感恩达拉特中学的培养，感恩党的教育,让我有了完美的人生。

达拉特中学让我收获了完美的爱情

我能考取达拉特中学,应该说是非常幸运的,但是学费是大问题。我的父亲是革命老干部,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从事党的地下工作,解放后在达拉特旗粮食局工作，不久就因病去世了,全家失去了生活来源。这时,母亲终于同意了父亲生前给我提过的亲事，对象叫李文华,是粮食局的干事。父亲认为他人品好、能力强、说话办事靠得住,还介绍他人了觉。两家商定的结果是: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后,李文华每月给我十元钱的生活费。为了不影响我念书,开学后,我住校;放假后,我回娘家住。我们这种名义上的夫妻生活维持了六年。婚后的家庭生活证明,李文华是一个值得我托付终生的好人,于公,他是国家的好干部,于私,是我的好丈夫,孩子们的好父亲。他还是粮食局篮球队队长。然而终因天不假年,在七十岁时离我而去,从此我痛失恩爱一生的伴侣,我非常怀念他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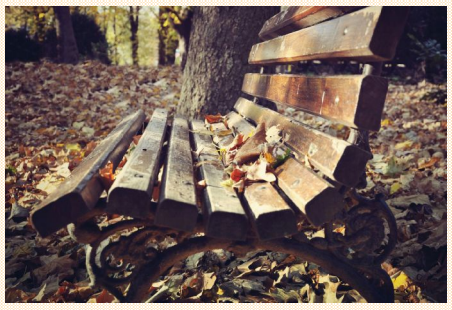
时代的浪潮,摆布着人们的命运。然而不论社会如何变迁,达拉特于我是一个固定的世界。年年岁岁,时序更替,我漫步城乡,眼前一派心仪的风景。我坚信，当我辈走出了人间的繁华,了无踪迹的时候,任凭母亲河日夜东流,涛声依旧,依然淘不尽我们师生书写的达拉特中学初创时那火红的年代、浪漫的过往。

在达拉特中学时,为了使井下作业的同学免受冷冻,他自掏腰包买了白酒,放上红糖,让同学们喝酒取暖。

在展旦台学校与民中的那些日子

尚俊琴

纵然世间一切都在变，但沉淀在心底里的那份深情、感念不会改变。不为别的，只为纪念被岁月遗忘的过去。1976年9月，不谙世事的我跳班来到了展旦召学校,和这所学校结下了不解之缘……这所质朴的学校现在还依然存在,是展旦召的一片净土,也是我成长的摇篮。



灰檐青砖的教室，四季更迭的校园，是我们这群叽喳吵闹孩子的乐园,在这里,我度过了难忘而快乐的小学及一年初中的学习时光。

常记得上小学时学校经常组织学生去周边的村子里务农,帮农民收割糜子、掰玉米、刨山药……上初一时,我们去给一队割糜子,由于早上学校没有早点,到了半晌,同学们早已饿得前心贴后背了，于是大家就穿梭于糜林中采“糜莓子”吃。糜莓子就是没有果实的糜子,起初是白色的“肉包”,到糜子成熟时就变成了黑的，我们班一个男生本身长得就黑,把糜莓子吃得满脸都是,黑白糜莓子粘着脸上,犹如一个七八十岁的老爷爷,引来同学们的阵阵笑声。

到了中午,村里给吃顿炖肉、馒头,那才是同学们劳动一天最期待的事情。到了开饭时,要排队打饭,由于村民分不清谁是谁，班里的男生就去打两次饭,把第一次打来的馒头埋在地里，把第二次打来的吃掉,之后才把埋在地里的挖出来,等馒头挖出来时已经变成了“沙包”,他们就把皮剥了吃。现在想起来,那时候的孩子,为了能吃上顿饱饭,什么也不讲究……那时候学校还有自己的菜园子,以解决学生们吃蔬菜的问题。秋天学生们都要参加秋收活动,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大鼻子道尔吉老师带我们去拔蔓菁,走时候我们带着好多袋子装蔓菁用，蔓菁拔好后要装进袋子里,然后用绳子拴住口子。道老师是东北蒙古族人,汉语说得不流利,他经常会半蒙半汉说一些话,他当时说的这句话我现在都记忆犹新:“素么利舞叶得个一个肚绳子拿得来！”大意是叫大家把拴口袋的所有绳子拿过来。

小学到初中,不知道换了多少老师,以至于我们连有些老师的名字也说不上来。我记得一年级班主任是阿拉腾布勒格,三年级上学期班主任是奇志新老师,下学期是奇老师的儿子，四年级班主任是雷明,五年级是老斯琴,初一是訾根根(阿如替帮特热海)。1979年9月,我们应该去达旗民中上学了,但由于民中在建设中,教室不够,我们就又在展旦召寄读了一年。1980年9月，我们来到了民中,正式开始了我们的初中生活,班主任是巴音孟克,我记得学校特别优待男生,他们住的是单间宿舍上下铺,而真正的花季少女却住的是24人的大宿舍、大木板床,一到晚上就闹“鬼”,以至于女孩们下得一晚上不敢睡。初三了,瘦小精干的王冬成了我们的班主任,一下子成了我们初三班的偶像。他,大背头梳得油光蹭亮，有着明亮的双眸、迷人的笑靥、棱鼻梁和一口齐整的牙齿。他似师长又似同学，教学方式生动、有趣又不失睿智,他的语态、手势、表情,以及同学们的掌声、笑声常常氤氲在教室上空。以至于我后来从事教学工作,每每声情并茂、抑扬顿挫地朗读课文时,都能赢得学生的阵阵掌声,很大程度上是王老师潜移默化的结果。

1982年7月,一张毕业照定格了我们的青葱岁月与友谊。展旦召学校、民中,在这里,悸动的是我们的心灵，浓烈的是我们的情谊，就像仓央嘉措的诗中所言:“不为巍见,只为贴着你的温暖……不为来世,只为途中与你相见！”